

我国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演化特征研究

李淑娟^{1,2} 王 彤¹ 高 宁¹

(1.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以我国 14 个滨海城市为研究单位,从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市场质量、旅游环境质量四个方面出发,对其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三个时间断面的旅游发展质量、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测算,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5-2015 年大多数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呈良性波动发展态势,但其总体增幅不大;14 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显著,其中珠三角地区内部差异最为明显;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可分为“量多质高”、“量少质高”、“量少质低”、“量多质低”四种类型。

[关键词] 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9.03.012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9)03-0147-14

一、引言

滨海旅游业是滨海旅游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滨海旅游的需求也开始增多。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业的发展质量,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性需求。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要有“量”的体现,更要有“质”的提升,如何正确认识滨海旅游发展“质”和“量”的协调性成为促进滨海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国外学者虽对旅游业的研究较早,但大部分都是研究其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成果。我国学者对旅游发展质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其概念内涵的探讨。钟士恩、张婕^[2]等学者系统地梳理了旅游质量、旅游目的地发展质量、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概念内涵,以期为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提升提供启示。李仲广^[3]、汪宇明^[4]在各自研究中都明确指出提升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指明了方向。二是对某一要素发展质量的探究。学者们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异同对旅游业发展质量中的某一要素进行研究。如在旅游经济质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海洋旅游资源整合与海洋旅游产业布局优化对策研究”(18CLYJ59)

[作者简介] 李淑娟(1977-),女,山东汶上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量方面,张洪、候利莉^[5]运用 AHP 从经济运行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两个方面对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大致呈现从东-中-西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关于旅游服务质量方面,众多学者^{[6]-[9]}运用 SERVQUAL 模型对不同的研究区域展开了研究,虽然 SERVQUAL 模型应用广泛但其在服务质量的衡量上略显不足。此外,在旅游环境质量^[10]、旅游体验质量^[11]方面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三是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研究。早在 2006 年陈秀琼和黄福才^[12]从产品质量、环境质量、要素质量、产业增长方式和产业运行质量 5 个方面对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进行定量评价,并得出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自 1994 年呈下降趋势的结论。此外众多学者把旅游业等同于旅游产业进行研究,如卢新新^[13]和史灵歌、彭永娟等^[14]从旅游产业要素质量、产业结构质量、产业运行质量、产品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等 6 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河南省的旅游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并得出了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的结论。

纵观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省域或者是某一截面的单独研究,缺少长序列、更为细化的以城市为单位的研究。因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旅游业发展一直处于领先水平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海口、三亚 14 个滨海城市为研究对象,借鉴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旅游发展质量综合发展水平及旅游发展质量中“质”和“量”的协调程度进行了探讨。通过改进的象限图法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分析以城市为单位旅游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期拓宽旅游发展质量的研究深度,为我国滨海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研究方法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

旅游发展质量不是简单意义上旅游产品质量的好坏,而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它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速度是否平稳健康运行的重要指标^[15]。基于对旅游发展质量的理解,认为旅游发展质量可分为两个方面:旅游效益质量和旅游规模数量。旅游效益质量即旅游发展的“质”,它是以产品、服务、环境等一组固有特性为基础,以游客和居民满意为核心,从而满足旅游发展需要、旅游消费需求的程度,具体包括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市场质量及旅游环境质量四个方面。旅游规模数量即旅游发展的“量”,它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旅游规模数量的发展速度,通常用旅游经济指标来衡量。考察一个地区旅游发展质量的好坏,不仅要看该地区旅游业持续增长的稳定性,还要看旅游发展的协调性,旅游发展速度过快或者过慢都不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保证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是城市旅游业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旅游发展质量的内涵出发,在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导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 14 个滨海城市的实际情况,构建 4 个子系统共 20 个指标组成的旅游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赋权法对其确定权重。熵值赋权法是通过计算各个样本,从中得出最优权重,从而反映指标信息所代表的价值^[16]。它的优点是能够克服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大领域,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 1。为尽可能反应实际情况,消除各原始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这

里采用 min-max 方法对其进行标准化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text{正向指标标准化: } x'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quad (1)$$

$$\text{负向指标标准化: } x'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quad (2)$$

式中, x_{ij} 为第 i 项指标在第 j 城市的原始数据, $\max x_{ij}$ 与 $\min x_{ij}$ 分别为第 i 指标在 j 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表 1 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目标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滨海城市 旅游发展质量	旅游产品质量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数(家)	0.0714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家)	0.0889
		自然保护区数量(个)	0.0554
		主要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天)	0.0272
		休闲观光活动平均指数	0.0436
	旅游服务质量	游客满意度(分)	0.0394
		星级饭店数(家)	0.0537
		旅行社数(家)	0.0570
		旅游从业人员数(人)	0.0890
		每万人公交车数(个/万人)	0.0416
	旅游市场质量	旅游接待人数增长率/%	0.0603
		旅游总收入增长率/%	0.0377
		游客平均花费(元)	0.0585
		入境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天)	0.0575
		平均客房出租率/%	0.0316
	旅游环境质量	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0.028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596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公顷)	0.0447
		城市污水处理率/%	0.0272
		固体废物综合处理率/%	0.0270

(二) 旅游发展“质”-“量”评价模型

1. “质”和“量”评价函数

借鉴学者廖重斌^[17]对珠三角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的探讨,以此为依据推广到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实证研究。令 $f(x)$ 为旅游发展质量中“质”的评价函数, $g(y)$ 为旅游规模数量中“量”的评价函数,具体指标通过各城市国内外旅游人数、国内外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来衡量。表示如下:

$$f(x) = \sum_{i=1}^m a_i x'_{ij} \quad (3)$$

$$g(y) = \sum_{i=1}^n b_i y'_{ij} \quad (4)$$

其中 x'_{ij} 和 y'_{ij} 分别为旅游发展“质”和“量”子系统中第 i 项指标在 j 城市标准化后的数值, a_i 和 b_i 分别为旅游发展“质”和“量”子系统中各项指标的权重。

2. 综合评价指数

为更好地反应旅游发展“质”-“量”的整体发展水平,本文引入旅游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 T ,具体表示如下:

$$T = \alpha f(x) + \beta g(y) \quad (5)$$

上式中 T 为旅游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 $f(x)$ 和 $g(y)$ 为旅游发展“质”-“量”子系统评价函数。对于滨海城市来说, 旅游发展“质”是反映其旅游发展“好”, 旅游发展“量”是反映其旅游发展“多”, 旅游发展的好坏不仅体现在“量”上还体现在“质”上, 因此旅游发展“质”和“量”同等重要, 则取 $\alpha = \beta = 0.5$ 。

3. 耦合度模型

借鉴杨士宏^[18]学者关于耦合度模型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旅游发展“质”和“量”耦合度评价模型。一般而言, 旅游发展“质”-“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越高, 旅游发展的耦合度就越高。令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度为 C ,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 = \left\{ \frac{f(x) + g(y)}{\left[\frac{f(x) + g(y)}{2} \right]^2} \right\}^{\frac{1}{2}} \quad (6)$$

上式中, C 为耦合度, 用来表示旅游发展“质”-“量”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程度; $f(x)$ 和 $g(y)$ 分别是旅游发展中“质”和“量”子系统评价函数。

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综合了旅游发展“质”和“量”的协调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层次, 反映了旅游发展“质”和“量”的同步协调发展程度,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 = \sqrt{C \times T} \quad (7)$$

上式中 C 为耦合度, T 为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由于“量多质高”、“量少质低”耦合度 C 均可出现高值, 因此耦合协调度更能反映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协调情况。

(三) 数据来源

文中各滨海城市的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旅游从业人员数、国内外旅游收入、国内外旅游人数、A 级旅游景区数, 风景名胜区数来自历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每万人公交车数来自《中国城市统计》; 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污水处理率、固体废物综合处理率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主要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休闲观光活动平均指数来自《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游客满意度、入境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平均客房出租率来自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国泰安数据库, 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三、旅游发展质量演化特征分析

(一) “质”系统演化特征分析

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市场质量、旅游环境质量共同构成了旅游发展质量“质”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由公式(3)可计算出 14 个滨海城市 2005 年、2010 年、2015 三个时间断面各子系统函数评价值, 具体函数值变化趋势见图 1、图 2、图 3、图 4。

受旅游资源分布、主要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等因素的影响, 2005-2015 年 14 个滨海城市旅游产品质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图 1)。2005 年、2010 年、2015 年旅游产品质量最高的城市一直发生变化, 分别是三亚、上海、杭州; 大连、天津、青岛、宁波、福州、厦门、深圳 7 个城市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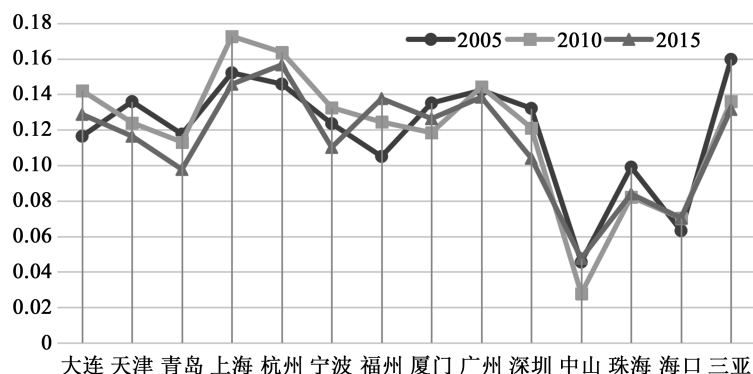


图1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产品质量函数评价价值动态变化趋势

旅游产品质量函数评价价值一直在 0.12 上下浮动,处于中等水平;而旅游产品质量相对较低的城市是中山、珠海、海口,旅游产品质量函数评价价值一直在 0.1 以下。究其原因,三亚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称号,旅游气候舒适度较高,非常适合开展滨海旅游,因此旅游发展质量较高。上海市、杭州市旅游知名度在国内外较高,加上旅游资源丰富,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数分别在 2010 年、2015 年位列第一,因此旅游发展质量较高。旅游发展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的大连、天津、青岛等城市虽然地理位置较中山、海口等相对靠北,旅游气候因素决定了靠北城市主要海水浴场适宜游泳天数相对较少,但是其 4A 以上旅游景区数在 2005-2015 年间大部分都在 10 个以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数也普遍高于中山、珠海、海口,因此整体的旅游产品质量高于中山、珠海、海口。从各城市旅游发展质量整体的变动情况来看,大部分旅游产品质量函数值变化不大,仅福州市旅游产品质量在 2005-2010 年一直在上升,究其原因,福州市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着力打造“都市、文化、温泉、江海”四大旅游品牌,丰富了旅游产品,从而提升了旅游产品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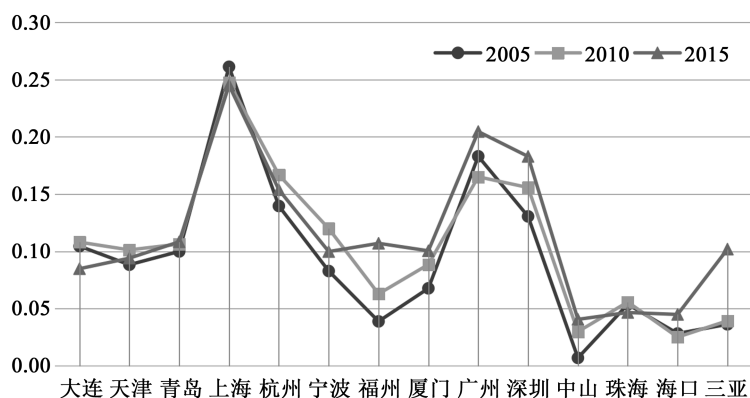


图2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服务质量函数评价价值动态变化趋势

由图2可知,14个滨海城市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城市之间旅游服务质量函数评价价值波动较大。2005-2015年,旅游服务质量函数评价价值排在前三位的一直是上海、广州、深圳,排在后三位的城市虽有所波动,但是中山、海口一直位列其中。2005年上海市旅游服务质量函数评价价值为0.2612,中山市仅为0.007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7.31倍,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

城市地理区位、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从旅游服务质量的变动情况来看,青岛、福州、厦门、广州、深圳、中山、海口、三亚8个城市旅游服务质量一直增加,且福州市、三亚市旅游服务质量变动较大,分别是2005年的2.7倍和2.6倍。究其原因,福州市政府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温福、合福等国内高铁的开通为福州市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亚市利用本地独特的海域风光打造国内高端星级酒店和旅行社,全方位、多角度提升游客满意度,从而提升了其整体的旅游服务质量。中山、海口2个滨海城市旅游服务质量虽然较之前有所增加,但是增长幅度较小,旅游服务质量函数评价值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中山、海口应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当地的建设规划中,健全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酒店、旅行社等服务流程,不断地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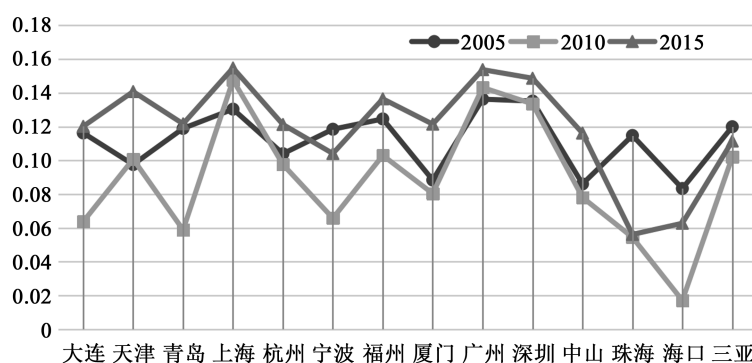


图3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市场质量函数评价值动态变化趋势

旅游市场质量反应的是各市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是否平稳有序,它是旅游发展质量的保障^[19]。由图3可知,2005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市场质量函数评价值差异较小,排名第一的三亚市仅比排名最后的厦门市高了0.0416,究其原因,2005年滨海旅游尚处在旅游发展的初期,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较少,加上各市的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因此14个滨海旅游市场质量尚未形成较大的差异。随着滨海旅游的快速发展,2010–2015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市场质量差异较为显著。上海市旅游市场质量一直位列第一,广州、深圳紧随其后。究其原因,上海、广州、深圳同为国家中心城市,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经济效益均较高,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和2015年迪士尼乐园的正式开放,促使上海市游客停留天数、游客人均消费在14个城市中排名第一,因此上海市旅游市场质量最高。2010–2015年排名后三的城市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中山、海口一直很低。由于滨海城市的开发状况不同,中山、海口所在珠三角地区、环北部湾地区旅游市场质量呈现出向广州、三亚高度集聚的现象,对中山、海口起到了一定的屏蔽效应,因此整体的旅游市场质量较低。

从各城市旅游市场质量函数评价值的变化情况来看,上海、广州、深圳、三亚、杭州5个城市旅游市场日趋成熟,整体变动较小。大连、天津、宁波、福州、厦门、中山、珠海、海口9个城市旅游市场质量函数评价值在2005–2015年变动较大,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多元化地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优化市场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使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由图4可知,14个滨海城市旅游环境质量差异显著,波动较大,但总体函数评价值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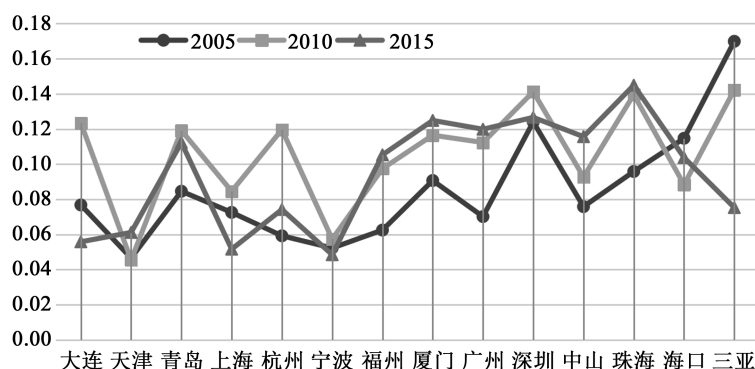


图4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动态变化趋势

均在0.2以下。由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的大小可知,2005年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排在前三城市是三亚、深圳、海口,2010年海口市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有所下降,珠海市取代海口市上升为前三位;2015年排名前三的城市变为珠海、青岛、深圳,三亚市旅游环境质量下降较快,较2005年下降了35%,排名也由2005年、2010年的第一下降为第九,这说明三亚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致使旅游环境质量下降较快。同时,2005-2015年上海、天津、宁波三个城市旅游环境质量在14个滨海城市中排名一直在后5名,旅游环境质量较为落后。

从图4还可看出,除厦门、珠海等少数几个滨海城市,大多数城市其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都在下滑,这说明各滨海城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传统滨海旅游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天津旅游发展质量函数评价价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相反,珠海、海口、中山却处于中高水平,就中山市而言,中山市旅游环境质量函数评价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2015年已上升到中高水平,在14个滨海城市中排名第六。这表明旅游业和经济越发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20],所以,滨海城市在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量”系统演化特征分析

由公式(5)可计算出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中“量”系统函数评价价值,具体函数值变化趋势见图5。由图5可知,旅游发展“量”系统函数评价价值在2005-2015年间呈波动变化趋势,各城市之间差异显著。根据各大城市旅游规模数量差异,可将14个滨海城市划分为4个梯度。第一梯度为上海、广州、深圳。这三个城市在2005-2015年间旅游量化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在研究时间内函数评价价值一直高于0.5,虽然上海市在2010年以后有所下滑,但是仍处于较高水平发展阶段。第二梯度为天津、三亚、杭州。三亚市在2005-2010年一直高于0.3,天津市、杭州市在2010年以后均达到0.3以上,上升幅度较大。第三梯度为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厦门、珠海6个城市。2005-2015年函数评价价值一直处于0.1-0.3之间,由于各地自身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不同,因此上升幅度有所不同。第四梯度为中山、海口两个滨海城市,旅游量化水平在2005-2015年一直较低。一方面原因是中山、海口相对于其他12个滨海城市经济实力不强,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另一方面原因是相比于同一区域的其他城市旅游环境一般,无法形成特色吸引力,从而导致其旅游总收入和人数等规模总量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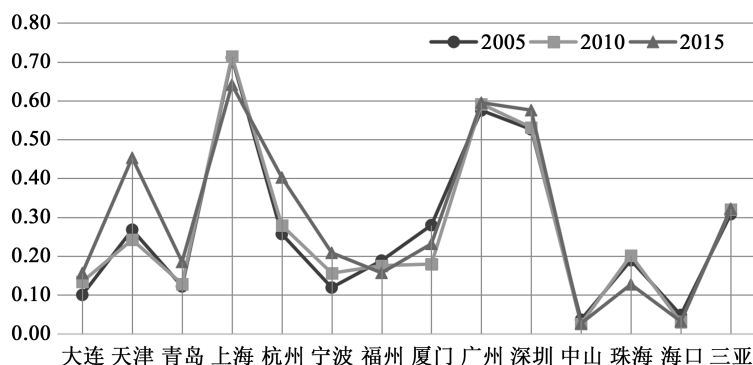


图5 旅游发展“量”系统函数值变化趋势

(三) 综合发展水平演化特征分析

通过公式(3)(4)(5)可计算出14个滨海城市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时间断面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具体变化趋势见图6。基于各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运用自然断裂法(nature breaks)可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高质量($T > 0.360$)、中高质量($0.256 < T \leq 0.360$)、中低质量($0.199 < T \leq 0.256$)、低质量($T \leq 0.199$),按照旅游发展质量类型划分结果,绘制出2005年、2010年、2015年三个时间断面旅游发展质量的空间演变图,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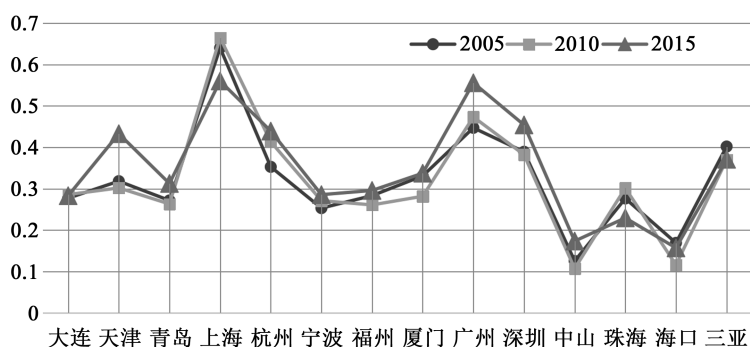


图6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动态变化趋势

由图6可以看出,2005-2015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在0.1-0.7之间呈波动变化趋势,但总体增幅不大。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大小,可将其分为4个梯度。第一梯度上海市,2005-2015年上海市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在14个滨海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虽然上海市2015年综合评价指数值较2005下降了18.61%,但在14个滨海城市中仍位列第一。第二梯度广州、深圳、三亚、杭州、天津5个滨海城市。天津、广州2个滨海城市2015年综合函数评价指数较2005年上升幅度较大,上升数值分别为0.131、0.0825。究其原因,结合各城市子系统发展质量来看,天津市、广州市有三个子系统在2005-2015年均保持正向增长,加上旅游规模总数较大,因此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上升较快。第三梯度为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厦门、珠海6个滨海城市,综合评价指数均无明显变化且一直在0.3左右徘徊。若想实现其旅游发展水平向更高水平迈进,需不断改善其旅游发展质量。第四梯度为中山、海口2个滨海城市,旅游综合评价指数值一

直在 0.2 以下,旅游整体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其他 3 个梯度的城市。

从图 7 可以得出,14 个滨海城市存在明显的差异,发展不均衡。2005 年处于高质量的城市为上海、广州、深圳、三亚,杭州、天津分别在 2010 年、2015 年由中高质量上升为高质量发展城市。2005-2015 年一直处于中高质量的城市为大连、青岛、福州、厦门 4 个城市,宁波市在 2010 年以后上升为中高质量城市,珠海市在 2005-2010 年一直为中高质量城市,2015 年下降为中低质量城市。与此同时,海口、中山一直为低质量城市,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较低。从各城市所处地区来看,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在 2005-2015 年变化不大,仅天津市、杭州市实现了中高质量到高质量的跳越。珠三角地区城市内部差异最为显著,究其原因,广州、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不仅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基础配套设施,旅游发展也已进入成熟期。中山虽为沿海城市,2005 年旅游总收入仅为 65.45 亿元,旅游产品质量综合发展水平为 0.0455,在 14 个滨海城市中位列最后,缺乏其核心吸引力,因此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海口和三亚虽同处环北部湾地区的海南省,但是其发展水平相差巨大。三亚市不仅旅游资源特色显著、基础设施较完善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海口市虽作为省会城市,但其资源特色不显著,配套设施和三亚也相差甚远,单从入境旅游人数来看,2015 年三亚市入境旅游人数是海口市的 2.94 倍。因此海口市应不断改善配套设施,多元化开拓境内、境外市场,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全方位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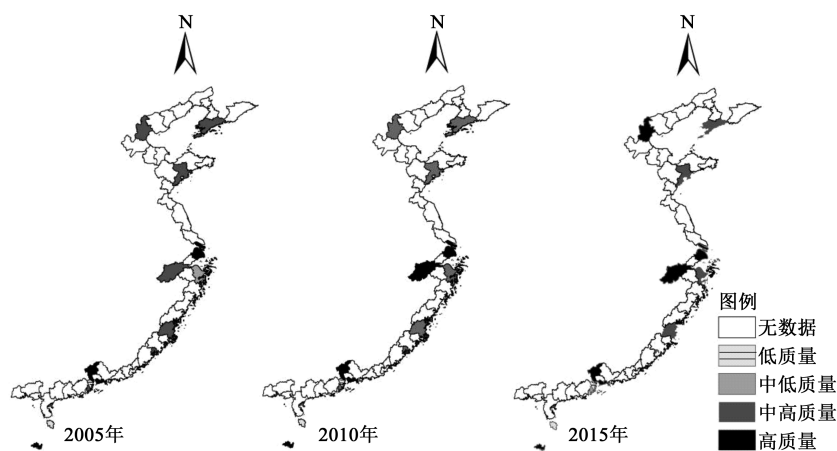


图 7 滨海城市不同年份旅游发展质量演化图

四、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及类型演化特征分析

通过公式(6)和(7)可计算出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度 C 和耦合协调度 D,具体数值见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度 C 数值在 2005-2015 年同耦合协调度相比整体较高,大多在 0.9 以上,说明旅游发展“质”-“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程度较高,但是“量少质高”、“量少质低”,C 的值均可出现高值,因此耦合协调度更能反映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协调情况。参照前人对改进的笛卡尔坐标系的研究^[21],分别以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旅游发展“质”系统和“量”系统函数评价值的均值作为原点,将整个坐标系划分成四个象限(见图 8,图 9,图 10)。相应的,旅游发展“质”-“量”被划分成四个不同的类型:“量多质高”型(第 I 象限)、“量少质高”型(第 II 象限)、“量少质低”型(第 III 象限)、“量多质低”

型(第Ⅳ象限)。

表2 滨海城市各年份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数值

年份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数值 城市	2005		2010		2015	
	C	D	C	D	C	D
大连	0.7692	0.4616	0.8472	0.4919	0.8940	0.5029
天津	0.9874	0.5604	0.9802	0.5439	0.9989	0.6575
青岛	0.8344	0.476	0.8589	0.4751	0.9129	0.5342
上海	0.9938	0.7977	0.9971	0.814	0.9895	0.7445
杭州	0.9622	0.5825	0.9457	0.6252	0.9965	0.6615
宁波	0.8478	0.4631	0.9058	0.4953	0.9629	0.5243
福州	0.9421	0.5165	0.7029	0.428	0.7691	0.4768
厦门	0.9880	0.5717	0.7029	0.5122	0.9495	0.5659
广州	0.9870	0.6642	0.9850	0.6828	0.9940	0.7433
深圳	0.9907	0.6209	0.9912	0.6154	0.9917	0.671
中山	0.7014	0.2963	0.6469	0.2631	0.5319	0.3036
珠海	0.9491	0.5121	0.9437	0.5333	0.8951	0.4531
海口	0.6993	0.3436	0.6772	0.2799	0.6032	0.3075
三亚	0.9722	0.625	0.9908	0.6054	0.9911	0.6063
均值	0.9018	0.5351	0.8697	0.5261	0.8915	0.5537

(一)耦合协调度演化特征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2005-2015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在0.2-0.9之间波动,但整体水平不高,大多城市在0.6以下徘徊。根据耦合协调度数值的大小,可将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分为高水平协调、中等水平协调、低水平协调三个层次。2005年仅有上海、广州、深圳、三亚4个滨海城市耦合协调度在0.6以上,处于高水平协调层次。2010年、2015年高水平协调城市分别在2005年4个滨海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杭州和天津2个滨海城市;2005-2015年,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厦门、珠海耦合协调度一直在0.4-0.6之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协调水平,若想实现向高水平协调的跳越,需妥善处理旅游发展“质”-“量”的关系;中山、海口两个滨海城市耦合协调度一直在0.4以下,处于低水平协调阶段。

从14个滨海城市耦合协调度变动情况来看,上海、福州、厦门、珠海、海口、三亚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其他8个城市均增加,上升城市占总数的57.14%。其中天津市上升最快,珠海市下降最快。上升和下降数值分别是0.0971和0.059。因为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是旅游“质”系统和旅游“量”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子系统函数评价值的下降或者上升都会导致旅游发展“质”-“量”协调度发生变化。从天津市、珠海市旅游发展子系统的变动情况来看,天津市旅游发展质量各子系统在2005-2015年有3项保持正向增长,加上天津市作为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城市,旅游业异常发达,2015年旅游总收入达到2815.84亿元,是2005年的4.88倍,天津市在注重旅游发展“量”的同时着重突出旅游发展“质”的功效,从而促使了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快速增长。而珠海市在2005-2015年期间旅游发展质量子系统有3项均呈负增长,旅游总收入在2015年仅为283.32亿元,在14个滨海城市中位列11,较低的旅游发展“量”和3项子系统的负增长致使珠海市耦合协调度下降较快。因此珠海市应根据自身情况,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模式,在提升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同时实现旅游发展

“质”-“量”的更高协调。

(二)耦合协调度类型演化特征分析

由图8、图9、图10可以看出,14个滨海旅游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分布在Ⅰ、Ⅲ、Ⅳ象限,相应的耦合协调类型为“量多质高”型、“量少质低”型、“量多质低”型。2005年“量多质高”型城市为上海、广州、深圳、三亚;“量多质低”型为大连、天津、青岛、杭州、宁波、福州、厦门、珠海8个城市,即旅游规模数量超前发展型;“量少质低”型城市为中山、海口两个城市,旅游规模数量和旅游发展质量均较低。

从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变化来看,2005-2015位于第Ⅰ象限的“量多质高”型城市呈递增趋势,杭州市、天津市分别在2010年、2015年由“量多质低”型上升为“量多质高”型。这说明天津市、杭州市在促使旅游规模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注重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实现了旅游发展“质”-“量”更高的和谐。2005-2015年间,“量多质低”型城市逐渐减少,仅大连、青岛、厦门、福州、珠海5个城市一直在位于第Ⅳ象限,处于旅游规模数量超前发展型。若各城市片面地追求旅游规模数量极易出现“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不合理局面。因此这几个城市应根据子系统旅游发展质量的高低,推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模式,从而促使其耦合协调度类型向“量多质高”型转变。2005-2015年,海口、中山市一直为“量少质低”型城市,在研究时间内并无实现任何突破,因此海口市、中山市应积极构建与本市旅游资源相匹配的旅游产业链,早日实现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打造属于本市的特色资源,促使旅游发展质量、旅游规模数量双提高,从而提升其耦合协调度的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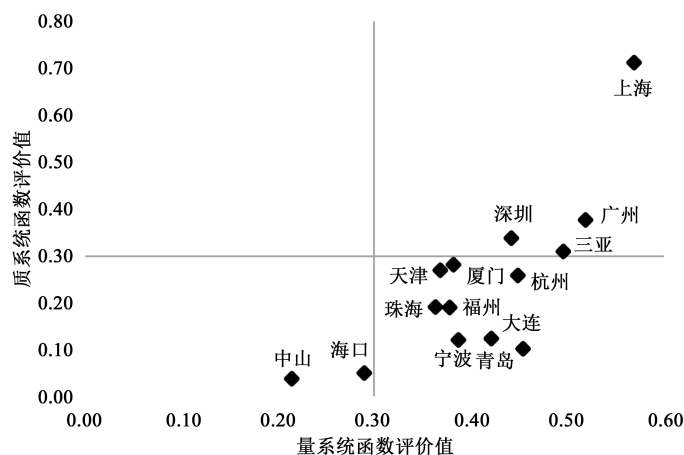


图8 2005年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关系象限图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以我国14个滨海城市为例,对其旅游发展质量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从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市场质量、旅游环境质量的演化特征来看,滨海旅游较发达的上海、广州、深圳、三亚等城市在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市场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但在旅游环境质量方面却呈现出相反的特征。(2)从旅游发展质量综合发展水平演化特征来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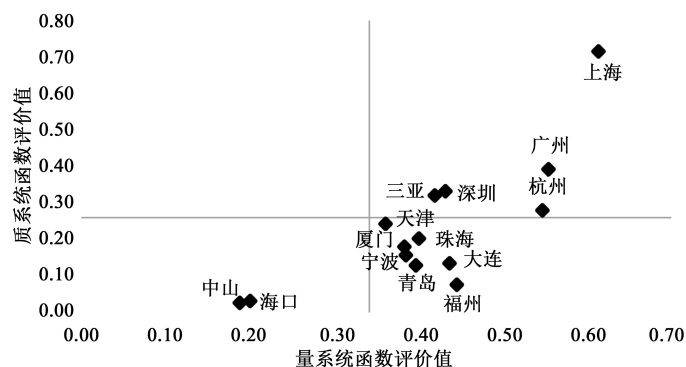


图9 2010年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关系象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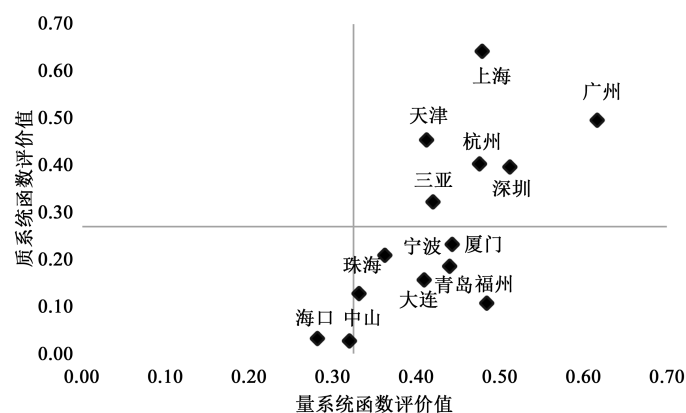


图10 2015年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关系象限图

2005-2015年期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上升的城市虽多,但总体增幅并不大,且各地区旅游发展质量分布迥异。(3)从旅游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来看,2005-2015年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大多城市分布在第IV象限,即旅游规模数量超前发展型。

(二)建议

结合14个滨海城市旅游业的具体发展情况,借鉴其他学者对旅游发展质量省际层面的研究,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滨海城市的旅游发展质量。

第一,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大专项资金投入。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作为朝阳产业的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因此各城市要明确旅游业的定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环境效益。此外,由于旅游业在发展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因此各个部门在加强自身服务意识的同时相互配合,明确自身职责,避免多头领导的现象。随着各市大力发展旅游业,上海、天津等滨海发达城市旅游环境质量逐渐下降,到了2015年旅游环境质量名次在14个滨海城市中位列倒数,相反中山、海口等滨海旅游相对不发达的城市上升到中等水平。这表明旅游业和经济越发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因此各城市应注重改善旅游业的发展环境,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中,应考虑旅游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增加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鼓励引导经济主体投资旅游业。

第二,加强区域合作力度,实行差异发展模式。随着滨海旅游的快速发展,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差异显著,以珠三角地区最为明显。近十年广州、深圳一直处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中山一直处于低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地区政府部门之间要加强合作,打破行政规划的束缚,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带动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发挥城市连带效应,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从更大的程度上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各城市所处旅游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容易出现明显的“质量短板”现象,因此应根据各子系统的具体发展情况,实行差异化发展模式,有针对性地推出恰当的措施,提高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加强对经济的贡献度。

第三,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协调发展。虽然各滨海城市海洋旅游资源禀赋度高,但是其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新型旅游产品种类少,具有较高的雷同性。鉴于各滨海城市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城市应顺应时代的需求转变现行的发展理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设计新兴的旅游产品,既要依托于旅游资源的自身的魅力,又要对旅游资源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同时还应顺应新一轮“互联网+旅游”的发展趋势优化旅游产业结构,让人工智能走进景区,运用于导游、门票等系统,从而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从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所处的类型来看,虽然14个滨海城市旅游发展质量类型大多位于中高质量,但是总体的耦合协调度不高,旅游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大多为“量多质低”型即旅游规模数量超前发展型。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不仅要注重简单的旅游规模数量增长,还应注重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同时更要重视旅游发展“质”-“量”所处的协调阶段。根据各市具体旅游发展水平,积极构建与本市相匹配的产业链,强化目的地的营销和旅游质量的监督管理,根据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加快改善薄弱环节的旅游产品供给,积极培育特色鲜明的新型旅游产品,实现旅游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 [1] 张红智,王波,韩立民. 全域旅游视阈下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业互动发展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4):135-143.
- [2] 钟士恩,张捷,尹力杰,等. 从旅游业发展质量看中国旅游现象与问题:兼探讨“游赏理念”的学科意义[J]. 人文地理,2014,(06):125-132.
- [3] 李仲广. 提升我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理论支撑[A].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旅游评论[C].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1:29-31.
- [4] 汪宇明. 彰显旅游民生价值,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J]. 旅游学刊,2010,(08):7-8.
- [5] 张洪,候利莉. 基于 AHP 的旅游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5,(10):1277-1280.
- [6] 徐荣林,王建琼. 基于员工视角的景区旅游服务质量实证研究[J]. 旅游科学,2016,(04):86-94.
- [7] 鲁小波,陈晓颖.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服务质量问题与对策[J]. 海洋经济,2015,(02):47-55.
- [8] 徐佳. 基于游客感知的山东省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6.
- [9] 黄毅,马耀峰,薛华菊. 中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时空态势演变与区域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2013,(12):1689-1701.
- [10] 毛先如,熊黑钢,朱跃晨. 北京市各区县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与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

(01):91-95.

[11] 马秀娟. 响沙湾旅游区游客体验质量提升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 2017, (03):422-425.

[12] 陈秀琼, 黄福才. 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 (12):1271-1280.

[13] 卢新新. 基于因子分析的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质量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4.

[14] 史灵歌, 彭永娟, 卢新新. 基于 AHP 的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实证研究[J]. 江苏商论, 2014, (03):51-55.

[15] 罗明义. 关于“旅游产业范围和地位”之我见[J]. 旅游学刊, 2007, (10):5-6.

[16] 李凤霞. 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以山东蓝色经济区为例[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2, (02):146-151.

[17]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热带地理, 1999, (02):76-82.

[18] 杨士宏. 城市生态环境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9] 邓爱民, 李慧. 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7, (03):108-112.

[20] 刘佳, 周长晓, 韩欢乐. 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以山东省沿海地区为例[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5, (03):139-147.

[21] 马艳梅, 吴玉鸣, 吴柏钧.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 经济地理, 2015, (06):47-53.

(责任编辑: 杨 磊)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in Coastal Cities of China

LI Shujuan^{1,2}, WANG Tong¹, GAO Ning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Oc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14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unit, from four aspects of quality of tourism products,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s, quality of tourism market and quality of tourism environment,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upling of "quality" - "quant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year of 2005, 2010 and 2015, and also analyzes its space-time evolution ru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ost coastal cities in the year of 2005-2015 showed a positive trend, but its overall growth rate was modest;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14 coastal cities are significant,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within the region;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quality is not high,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high quality and more quantity", "high quality and less quantity", "low quality and less quantity" and "low quality and more quantity".

Key Words: Coastal cities; Qu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Coupling degree; Space-time evolution